

老战士 谷书

十年百战亲历记

肖 锋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老战士丛书”题签：舒 同

老 战 士 从 书
十 年 百 战 亲 历 记

肖 锋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2插页 208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30

书号：11173·74 定价：1.00元

前　　言

本书作者肖锋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在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军老战士。他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江西泰和县红色游击队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底，这二十二年的战争岁月里，先后担任过游击队长、独立营长、团政委、旅长、副军长等职务。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战役，参加战斗一千三百六十多次。

肖锋同志出身于井冈山下一个雇农家庭，自幼家境贫寒，讨过饭、当过裁缝徒工，从未进过学堂。但从大革命末期以来，他就在党组织、老首长的关怀教育和革命战友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在战斗频繁的间隙，刻苦自学文化，并且一直持续不断地写了五十六年日记。这些日记，曾整理成以土地革命、八年抗日和三年解放战争为内容的回忆录。《十年百战亲历记》是肖锋同志近年根据自己的日记，重访当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地区，进行调查核实后补充整理写成的。

在这本书中，重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壮丽画面，歌颂了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屈不挠、英勇战斗、舍生忘死的崇高革命精神。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了王明、张国焘“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旧中国的悲惨景象，并认识到新中国来之不易。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在旧社会讨饭的孩子，是怎样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因此这本书也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历史教育的一本好书。

肖锋同志在整理和修改本书的工作中，得到北京军区装甲兵领导机关和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老战士诗文集》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

目 录

一	响应秋收起义	(1)
二	智取泰和县	(7)
三	四打万安城	(14)
四	送粮上井冈山	(21)
五	红军九打吉安府	(26)
六	第一次反“围剿”龙冈大捷	(40)
七	第二次反“围剿”首战白云山	(50)
八	第三次反“围剿”突围打艮村	(56)
九	列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65)
十	战斗在中央苏区南大门	(71)
十一	在第一期列宁团校	(79)
十二	在马克思主义大学学习	(89)
十三	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	(105)
十四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决 战	(119)
十五	温坊大捷	(127)
十六	保卫高兴墟	(131)
十七	渡湘江恶战全州	(138)
十八	占黎平直奔遵义	(152)
十九	八渡赤水甩开敌 人	(160)

二十	凯旋遵义召开大会	(165)
廿一	佯攻贵阳逼昆明，飞兵巧渡金沙江	(171)
廿二	强渡大渡河，抢占泸定桥	(178)
廿三	闯过夹金山，会师毛儿盖	(187)
廿四	艰难涉草地，赤化川陕甘	(198)
廿五	要的是歼灭战	(212)
廿六	东征抗日先锋军	(225)
廿七	回师西渡	(235)
廿八	西征路上战“三马”	(245)
廿九	静宁、会宁三军会师	(258)
三十	三军决战仙城堡	(261)
卅一	占渭河，保西安	(269)

一、响应秋收起义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宰割、蹂躏下，山河破碎。广大人民群众为刀兵水火、天灾人祸所逼，离乡背井，转死沟壑。中国大地，到处是血泪，遍地是哀歌。

一九一六年二月七日，我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南坑村的一个雇农家里。我出生前，父母只有两个女儿，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我呱呱落地时，全家人都为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而非常高兴。父亲给地主干了三十年长工，这时他不干了，想靠贩卖水牛过日子。他到处借钱，贩来了一头水牛。然而，冷酷的现实却给了他一次致命的打击。耕牛刚贩运回家，夜里就被人偷走了。从此家里就一贫如洗了。到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在忧郁、饥饿的折磨下去世。在这些沉重打击下，母亲哭干了泪水，眼睛也瞎了。大姐出嫁之后，生活的重担就完全落到了二姐的身上。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不得不上山打松子、拾柴禾，帮助二姐分担生活的重担。

旧社会，穷人是没有活路的。二姐出嫁时，我只有七八岁，就去沿村讨饭，和老母亲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有一次到地主家要饭，地主的大狗把我的脚咬了两口，鲜血直流。我的堂兄忠浩和堂嫂闻讯赶来，把我抱回家治伤。一九二四年春，我刚满九岁，就到中步陈家拜陈繼蓬为师，学裁缝。在陈家的三年中，

我除了学作衣裳外，还得给师娘和他们的独生女儿洗衣服，端屎端尿，稍不当心，就挨打挨骂。一九二六年八月中旬，北伐军张发奎第四路军进到赣州吉安待机，我们为第四路军赶制军服，支援北伐战争。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我在吉安府参加了童子军，积极支持北伐国民革命活动。我坚决反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在这几年里，我在吉安和附近五个县做衣服时，经常接触国民革命军，尤其是听到人们暗地里讲共产党的事情。我有一位叔叔叫肖思沁，他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家乡后，就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党、团组织。当时他担任南溪村中心党支部书记，我有空就跑到他家里，听他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和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因此，我就慢慢懂得了穷人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明白了一九二七年吉安反动派在“四·一二”之后为什么屠杀共产党员，以及后来发生的许多大事。八月一日，在南昌，共产党领导了武装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毛委员九月九日在湘赣边领导了武装起义。当我转到泰和万安窑头、百嘉一带做衣服时，又听到曾天宇同志在万安，康纯同志在泰和点燃了革命火种，回到中步陈家时，知道东固山也有红军活动。

这时在江西省委和赣西南特委领导下，泰和农民积极响应秋收起义，县委正在组织农民暴动。当时泰和党支部委员会，临时受吉安县委领导，有党员二十五人，共青团员四十五人。那时党的活动是单线联系，县委组织虽被破坏了，党、团员照样活动。泰和党组织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派刘兴汉、杨德明（山东人）等人到南昌寻找省委，正巧刚刚爆发“八一”南昌武装起义，他们就跟着南昌起义军退出南昌，经瑞金、汀州、潮汕到了广州。在广州，他们听了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讲话，获悉武汉

“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大意是中央决定根据新形势，在湘、赣、鄂、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搞土地革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他们就赶紧经韶关、信丰坐轮船返回江西泰和县，时间已经晚一个多月。九月下旬，泰和县委在沙村、固陂墟召开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刘兴汉、杨德明同志把张太雷讲的情况向党、团员作了传达。会议决定，首先在沙村、冠朝、固陂墟组织六百多人的赤卫大队，集中了六支枪和一批刀、土枪、土炮等。就这样，经过了几天秘密训练，十月八日在新西坑、下坑、沁田、平原、虎倒坪、白竹、南坑、勘头等三十多个乡村联合举行了固陂农民武装起义，把土豪劣绅抓了起来，分别进行了惩处和罚款。各村都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纷纷组织乡、区农民协会。到了第七天，国民党靖卫团肖治炳旅开始反扑，农民被杀一百多人。这就激起广大贫苦工农的更大仇恨，大家都说：“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这回要靠我们这代人把它推翻！只要有共产党，仇就一定能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那时我刚满十二岁。这天下午，堂兄肖忠焕到我家来，避开母亲低声对我说：“忠渭，你怕死不？你敢不敢到俄国去？”乍一听，我吓了一跳。一个穷山沟里的娃子，斗大字都不识一升，不要说到俄国，就是去南昌我也没想过。其实，他说的到俄国去，就是说要去找真理，就是团结工农起来闹革命。我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过了四次农民武装斗争，胆子也练大了。于是我回答说：“敢！”

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忠焕带着我来到南溪村南禾坪上的一间茅屋里。陈永吉、祖照、忠浩等人已经先到了。这时，只见忠焕把一张红纸，横挂在北墙上，纸上写着“CCY”几个字。我正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忠焕便对我们说：“大

家站起来，我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你们举起左手跟我宣誓！”我们都举起左手，跟着他一句一句地说：“打土豪分田地，不还租，不还债，为穷人谋解放，跟着共产党，努力学习，热心革命，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团。”

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走向革命的新起点。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短暂经历：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我参加了泰和县委领导的新西坑、下坑等三十多个村联合举行的固陂农民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后来又先后四次参加攻打万安城的战斗。战斗中两次扛红旗冲锋在前，冒着最大危险挥旗引队前进，第二次参加神炮队有力地配合农军攻打了万安城。革命是艰难曲折的，道路是漫长的，所以我一直盘算着如何更加努力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母亲听到我的脚步声便问：“半夜还不睡觉，干什么去了？”母亲含辛茹苦，操劳了大半辈子，我怎能又叫她为我操心呢。我只好撒个谎说：“到顶洞坑打豺狗去了。”组织给了我今后活动的纪律、暗号，兄弟关系就成了同志！这一夜，我心情很不平静，老是在想“CCY”意味着什么？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利用到各村干裁缝活作掩护，了解敌人活动情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和陈师傅、刘师兄由湖巴出发，经黄坑过赣江转黄坑棚下肖家，到刘庆提老俵家做衣服。目的是要摸清沿溪渡肖百万团匪的情况。午后四点多钟，一个反动团匪窜进刘家，想要强奸刘家儿媳妇。刘师兄就连推带拉把这个家伙拉到了刘家的西房，我拿起菜刀，连砍两刀，就结束了这个团匪的狗命。为防止意外，我们趁黑夜把这个团匪的尸体掷进了赣江，把枪支在刘家墙洞里藏好之后，就赶忙提着裁缝工具，从黄坑棚下渡江回到了竹山。

红军第四次攻打万安城之后不久，国民党第14军刘士毅部就开始反扑，四处捕杀革命者。为了回击敌人，保卫革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泰和县委决定组织红色游击队，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根据少共固陂墟区委和县委指示，我们联络了以固陂墟南溪乡为中心的九个村四十二个青年，由我带到虎倒坪集中，同泰和县其他区的四十三个青年汇合，共八十五名战士，正式成立了泰和游击队。这支红色游击队有二十一人是参加过北伐和“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其中有八个党员，二十多个团员。由袁邦福任队长，王曰群为党代表。全队辖三个小队，我担任第一小队长。

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也进一步加强了。九月初，王代表利用部队休整机会，传达了毛委员在遂川县黄冈区军民大会上所作的井冈山八月失败的总结和红军的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不久，袁队长又传达了曾龙福同志在泰和县游击队会议上的讲话。曾龙福同志明确提出：要加强游击队中党支部的作用，支部要建在连队，做到每班每排都有党团员；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队长和党代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士兵委员会的主席要在班长以下的战士中选举产生，部队打仗休整都要通过士兵委员会民主讨论，通过后由队长、党代表执行。要改造部队作风，健全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发扬民主，要让战士讲话，不论干部战士，谁要违反部队纪律，士兵委员会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制裁。这一套传统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部队时总结出来的，它的进一步推广，对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

在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游击队不断打胜仗，队伍也不断扩大。根据泰和县委决定，我们的游击队正式被命名为“泰和

县游击队”，并授予队旗。袁邦福、王曰群同志仍担任游击队的队长和党代表，我担任副队长。随后，我们召开全队会议，向队旗宣誓，并由王代表报告了斗争形势。全队同志决心在县委领导下，坚决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积极帮助各地组织发展农会，配合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保卫革命成果。

二、智取泰和县

这时的江西，到处埋藏着革命的火种。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党组织被摧毁，很多共产党人被杀害。但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许多党员都转入了地下，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党的组织依然存在。特别在东固山，泰和、万安、吉安一带，还有上千名从张发奎北伐第四军中跑出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士兵，他们看透了国民党篡夺北伐革命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不愿再为国民党当炮灰，宁愿到处流浪。这些人是革命的骨干。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消息传来之后，人人欢欣鼓舞，只盼着共产党快来。人们心中积压的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怒火，就要汇集成为一场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固陂农民的起义得到万安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也促进了万安曾天宇同志的行动。在赣江东岸罗塘村、村背，曾天宇召开了全县支部书记廿五人的联席会议，成立了全县暴动行动委员会，作为全县的指挥机构。曾天宇同志同泰和县委康纯、朱海玉、曾延生、肖拔群等同志研究决定，乘泰和没有敌人重兵，只有靖卫团一百多人，敌人主力已调往吉安的大好时机，先由万安有武器装备的一百多名游击队员，乘两只快船，化装成敌人刘士毅的部队，开进泰和城，两千多名泰和县精干农军在泰和城外等候，等万安游击队进城占领了城内万寿宫，即擂响大鼓。听到鼓声，泰和两千农军由东西两门迅猛冲进泰和城。万安的武装游击队专打

县政府，泰和农军袭击伪靖卫团。计划制定后，立即布置行动，第一次巧袭泰和城。

经过详细侦察和充分准备，万、泰两个县委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组织两县农民武装开始了联合行动。

这天清晨，曾天宇、刘兴汉、杨德明率领万安数十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打着敌十四军的旗号，大摇大摆地从东关进了泰和城，进城之后就直奔县政府。敌人还蒙在鼓里，伪县长高本旗“亲自”出马，组织人敲锣打鼓的欢迎“刘部”，并摆开盛宴招待这一批“刘部官兵”。酒宴正在进行。曾天宇同志掏出了手枪，对着脑满肠肥的伪县政府人员和土豪劣绅大喝一声：“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马上放下武器，谁要乱动，我们绝不客气！”望着黑洞洞的枪口，敌人吓的魂飞魄散，纷纷交出了身上的武器，有四个人掏枪企图反抗，当场被击毙三名，一人逃跑。我们活捉了绝大多数“县府文职人员”（只有伪县长高本旗、伪财务科长张蓬时从后门逃走），缴获长短枪廿多支，弹药六箱，现洋四千元，捉住了四个土豪劣绅。曾天宇、康纯同志还带领游击队迅速打开了牢房，释放了一百多名“政治犯”和普通犯人。城外泰和的两千农军冲进城后，分两路包围了靖卫团，经过廿多分钟的激战，打死敌人二十多名，打伤敌人五十多名，缴枪七十多支，俘敌一百多名。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两县游击队和农军扛着红旗和缴来的快枪，押着垂头丧气的俘虏有秩序地撤出了泰和城。这一仗农军只牺牲五名战士，伤员廿多名，除主犯外其他俘虏都陆续释放了。实在是一个漂亮仗。由于我军声势很大，从吉安派来支援泰和的敌军非常谨慎小心，进展十分缓慢，直到中午才到县城，他们只能望着自己部队的尸体和我军插在四面城门上高高飘扬的红旗发呆了。

我游击队和农军撤回后，分别乘木船回到永昌市或三都圩分

散回乡，万安游击队渡江到永昌市经窑头回万安去了，那两只快艇也放在永昌市的一个河岸边隐蔽了起来。

第一次打泰和就取得了这样的战果，我们泰和游击队和农军不用说有多高兴了。大伙都说：敌人装备好，可我们穷人多呀！队伍从江边退回之后，组织派我以做裁缝为掩护到东岸永昌市监视吉安援敌动态。泰和县党委也转移到冠朝潜伏下来，积极协助万安农民，准备攻打万安城。这一下把万安城的土豪劣绅和土匪吓坏了，他们到处跑。

有一次组织要我到窑头去作衣服，任务是观察敌人火轮的交通往来情况。当时我想到，既然已经参加了工农革命，就要为革命干到底，不然国民党捉住我也是非杀头不可，于是干革命的决心就更大了。

游击战争的生活是艰苦而又紧张的。但是，我们的队伍日渐发展壮大，泰和游击队这时已由原来的八、九十人，扩大到了一百多人。而且女同志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曼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游击队当文书，一边参加战斗，一边帮助战士学文化。每次战斗空隙，她都教我认字、写字、写日记。我学会了写战斗日记，是和她的耐心帮助分不开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我游击队又一次袭击了驻守罗家墟的靖卫团，毙伤敌军四人，缴获了两支快枪，敌人全部溃逃。这次战斗，不仅赶跑了罗家墟的敌人，而且缴获了当铺的不少财物。我们把这些资财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然后就安全撤退到张苍松深山休整。正在我游击队四出袭扰敌人的时候，中共泰和县委指示我们：要深入到赣江西部，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敌人，要我们积极配合万安独立团和东固山、桥头镇的红二团、红四团行动；要经常保持和赣江东西两岸、井冈山同东固山的紧密联系，要加强游击队的支部工作和团结，保证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

导。泰和县委的指示给我们游击队指明了斗争的方向。遵照县委指示游击队派我率领一个分队袭击驻守竹山、大祠堂的靖卫团。有一次靖卫团一百多人偷袭河东游击根据地，我奋起反击毙敌二名，伤敌八名，缴获快枪两支，并处决了四个恶霸地主。我队又偷渡赣江，袭击泰和东关的旧政府，毙、伤敌人廿五名，缴获快枪十支。当我游击分队刚回到酒溪，万安靖卫团的一百多人，立即向我反攻，我游击分队利用树林掩护，且战且退，安全撤到了东山。

我游击队机动灵活的袭击靖卫团，搞得敌人坐卧不安。十月七日，万安靖卫团集中一千多人，向我游击队活动地区白沙、桃花洞进攻，企图一举消灭红色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白军进山，游击队转战到平地的紫瑶山、虎倒坪、辛治坑、干江边、张港等地，跟敌人来了一个换防。

一九二九年元月四日，泰和县委负责人传达朱军长、毛委员在白露召开的由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参加的联席会议精神，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讨论如何粉碎湘、赣、粤三省军阀的第三次“围剿”；二是讨论准备下山向闽赣粤发展苏区，开创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朱军长、毛委员仍在茅萍准备东征工作。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井冈山红军除留 5 军和32团坚守井冈山外，主力红军由朱、毛率领下山，深入到闽西和赣南开创新的苏维埃区域。下山前，朱、毛根据泰和县委的要求，派红20军58师到泰和，同泰和独立营、游击队和农军配合第二次攻打泰和。

在赣西南特委指挥下，二月十四日，泰和游击队和农军由县委曾龙福同志率领，渡过沿溪渡，经过狗阁老91高地，在枫塘桥与红20军58师会合。部队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部署了

新的行动计划。按20军58师师部指示，下午兵分两路进抵泰和城下。晚上七时，我军发起攻击。守敌是14军刘士毅部一个团，我军突然进攻，敌人被迫仓促应战。按照预定分工，我泰和游击队配合58师164团为一路，攻打北关，58师其余两个团攻打南关。战斗持续到十五日拂晓，敌一个团兵力由赣江乘火轮向泰和增援。根据当时情况，58师下令停止攻击，部队后撤。这次攻城，俘白军二百多人，缴枪五十支，水机枪一挺。但是，由于组织不周密，后方空虚，敌人组织兵力从西关偷袭了58师的后方，使攻城受到了影响。

第二次打泰和结束后，我游击队先在三都圩一带打游击。二月十九日回到罗家墟。

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我军第三次攻打泰和也未成功。毛委员早就指出“赣江两岸广大农村是我们的”。只要我们有发展、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最后一定能夺取城市。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盲目的行动只能给革命带来损失。

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红20军在泰和独立营和农军的配合下，第四次攻打泰和，将守敌刘士毅14军42师125团和军工兵连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干净、利落。从五月七日凌晨四点开始，我独立营协同20军184团攻东关，到七日早晨战斗结束。俘敌八百多人，缴获枪四百多支。活捉了伪县长高本旗，交给群众大会宣判处决。红60师命令我队担任城防，维护秩序，捉拿反水地主、恶霸、豪绅、坐探，共计捉了二百多人，凡是群众一概释放；对地主、土豪可不客气。这次打泰和县处决了不少反水地主、恶霸、豪绅。我队当时住在万寿宫，把菩萨都打光了，还把煤油店也烧了，结果附近房子也烧着了。42师政治部派干部来，要我们保护工商业，不能见店主就捉拿，允许前门商店，算为工业，后院是封建剥削可以分别处理，是商业又是地主，按工商业政策处理。

政治部宣布不要破坏这个规矩，就请泰和城的广大工商业者都开门，一定要买卖公平，说话要和气。对那些不讲政策的干部、战士要给予处分。当时游击队里还打屁股，坐班房，这是由士兵委员会出面决定的，有时领导也批准。

战斗结束，我游击队奉命驻防泰和城，维持秩序，保护工商，对不法行为，破坏工商政策者予以严厉制裁。五月九日我营坐轮船回到了罗家墟。

第四次攻打泰和后，红20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同志，于凤凰墟主持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打泰和的经验教训，传达了毛主席古田会议精神和寻乌调查时提出的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提倡实事求是作风和部队管理工作的七条原则，大意是：

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真正和战士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

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这是测验每个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团结得象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

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执法违法，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根除。

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要充分地